



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心态

*Utopia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耿传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

——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与乌托邦心态

耿传明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现代中国文学中的乌托邦
与乌托邦心态 / 耿传明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310-04399-6

I. ①来… II. ①耿…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065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230×170 毫米 16 开本 22 印张 2 插页 343 千字

定价:4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该书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中国乌托邦小说研究”的
结项成果，项目编号：**07BZW052**。

本书出版得到了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经费的
资助。

南开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nkup.com.cn>

投稿电话及邮箱: 022-23504636 QQ: 1760493289
QQ: 2046170045(对外合作)

邮购部: 022-23507092

发行部: 022-23508339 Fax: 022-23508542

南开教育云: <http://www.nkcloud.org>



App: 南开书店 app



南开教育云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国家数字出版基地、天津市多媒体教育技术研究会共同开发, 主要包括数字出版、数字书店、数字图书馆、数字课堂及数字虚拟校园等内容平台。数字书店提供图书、电子音像产品的在线销售; 虚拟校园提供 360° 校园实景; 数字课堂提供网络多媒体课程及课件、远程双向互动教室和网络会议系统。在线购书可免费使用学习平台, 视频教室等扩展功能。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期盼与超越：《回头看》开启的乌托邦之门	22
1. 《回头看》：近代乌托邦的母本	22
2. 近代乌托邦兴起的动因与整体性危机的历史情境	35
3. “进化论”：历史意识与乌托邦力量的融合	41
第二章 《大同书》和《新年梦》：“大同之理”对一切“世间法”的 颠覆	45
1. 《虞初新语·人肉楼》与“新文明论”的兴起	45
2. 《大同书》：“纵仁义之欲”的“康子”与公同平等的乌托邦	49
3. 《新年梦》：“公意说”和“科学主义”的社会理想	60
第三章 “政治小说”：救世承诺、乌托邦情怀与创造历史的要求	68
1. “政治小说”：改良群治的灵丹妙药	68
2. 《新中国未来记》：“新小说”的示范与“宪政派”的富强承诺	73
3. “人权村”和《卢梭魂》：激进革命派的“圣经”	79
4. “公理至上”信念与救世主义的文学政治	86
第四章 “医国方”与“强国梦”：乌托邦与现实的反差与纠结	91
1. “新民”与“立人”——精神变革与改造人性	92
2. “三年之病当求七年之艾”——育人为本的“教育救国”梦	101
3. “金铁主义”与“实业救国”梦	105
第五章 《新石头记》：“未来中国”、“孔道”与中国历史文化的连续性 展望	110

2 来自“别一世界”的启示

1. 以《新石头记》为代表的“孔道”中国理想	113
2. 以强国为本的“开明专制”	117
3. 围绕“立宪”的信与疑、喜与悲	121
第六章 “未来世界”、现实焦虑 与科幻乌托邦	126
1. 作为时尚“舶来品”的科幻小说	128
2. 现实焦虑、制胜之术与科学幻想	134
第七章 “浪漫爱”的兴起与唯情主义乌托邦	143
1. 时代浪子的人生偶像：拿破仑和贾宝玉	143
2. “情其性”对“性其情”的胜利	147
3. 鸳鸯蝴蝶派小说与民初“共和”氛围	150
4. “浪漫爱”的兴起与“不落闹攘套中”的“真情生活”	151
第八章 沿海都市的兴起 与反乌托邦的市民立场	155
1. 非人情化的洋场伦理与世风日下的道德感伤	155
2. “新党”、“志士”的讥讽者和德与政的分离	160
第九章 五四：“新世界的曙光”、“涅槃再生”渴望与审美个人主义乌托邦	167
1. 五四新文化与新世界的召唤	168
2. 插入自然和流俗时间中的历史倒计时	192
3. 涅槃再生情结与“新世界的曙光”	197
4. 爱和美乌托邦	202
第十章 30年代：革命·乡愁与《鬼土日记》、《猫城记》中的中国镜像	209
1. 左翼小说与“红色30年代”	211
2. “民族主义文学”与“力本论”的乌托邦	218
3.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巴金与他的安那其信仰	221
4. “牧歌中国”：从记忆中营造的诗意乌托邦	229
5. 亡国噩梦的预演：《猫城记》与乌托邦的忧愤	235
6. 《鬼土日记》：现实的“鬼土化”与反资本主义的普罗寓言	246

第十一章 40 年代：“战时文艺复兴”、解放区颂歌与新浪漫派的审美乌

托邦	260
1. “抗战救国”共识与“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对立	261
2. 徘徊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无枝可栖	272
3. 《遥远的爱》：无可安顿的生命与无法驻足的追寻	274
4. “改男造女态全新”：“新天地”中的“新文艺”	276
5. 《秘密谷》：末世桃花源的沦陷与现代人的乡愁	283
6. “战国策派”的文化哲学与入世的浪漫、英雄主义	287
7. “新浪漫派”与审美个人主义的乌托邦	296
结 语	322
后 记	342

导 论

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1872）就已经预感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是从中国文化定型以来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①，如此“非常之变”必然催生“非常之道”，“新症”已非“古方”可医，这在“甲午”之后的士人阶层中已普遍成为共识，近代中国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便是中国人为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变化而出现的突出文化现象。近代乌托邦承载着“富国强兵”和实现“新文明”的双重使命，集中表现出中国人从“一统垂裳”、“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子民进入到“列国并立”的“民族—国家”的国民之后文化心态的变化以及在知识、情感、意志方面的全面解放。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不只是对外部威胁的被动的应对，也是一个主动求变，而且是“大变”、“全变”的过程。所以，了解人们曾经“想做什么”这种“人心的历史”（严复语）与考察人们实际“做了什么”这种“人身的历史”同等重要。乌托邦文学是考察近代中国的文化心灵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它以文学所营造的、特有的“审美共通感”，填补了传统衰微后形成的“信仰真空”，在变革时代产生了强大的凝聚人心、推动变革的社会作用。乌托邦文学的兴盛极大地提升了文学的文化地位，促进了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对于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 also 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上，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既充满憧憬也满怀困惑，既充满忧患也满怀期待，中国文化本身就不是一味保守僵化的文化，《诗经·大雅》中即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箴言。在旧

^①《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五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19页。

的世界日渐颓败、衰微，而新的世界扑面而来、生机勃勃之时，弃旧从新也就成了一种普遍的选择，即使并不怎么激进的士人如郑孝胥者在他的《哀五十》一诗中也曾写下了“读尽旧史不称意，意有新世容我侪”的诗句，至于激进的革命者态度则更为激愤、刚爽，如蒋智由的诗：“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走出传统、斩断传统以求得涅槃新生，成为时代先觉者的强烈心声，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下，乌托邦文学的兴盛也就不难理解了，它成为先觉者弃绝、不满于传统和当下的政治现实的精神依托、批判利器，旧世界愈腐败、愈不可救药，这种对新世界的向往便愈强烈、愈难以抑制。然而任何的外植的“新”必须为“旧”的母体接纳才能成长，只有当“旧”容纳了“新”，古树长出新枝，才能使“新”成为自己生命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弗失固有之血脉”才能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创新。因此如何将“旧邦”的特性与时代的“新命”结合起来，促成传统自身的现代性转换，就成为时代赋予现代中国人的一大使命，如何在不失其固有的历史文化的连续性的条件之下完成现代中国的“强国梦”和“新文明”的构想，成为现代中国人思考未来时必须面对的问题，以想象未来为主旨的乌托邦文学也就成了我们思考这类问题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严复曾把历史分为“人心所造之史”和“人身所造之史”，乌托邦即是这种“人心所造之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乌托邦历史的研究类似于一种“希望考古学”，它所揭示的是人们创造历史的主观动机、心理期待、意志和愿望，只有了解了创造历史的人的内心世界才能对历史本身产生更为深入的理解。因此对乌托邦的研究，对理解中国所发生的由传统向现代的巨大转折、古今之变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乌托邦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和精神文化现象，对整个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它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产生的直接源头，是中国现代性文化、文学的开路先锋，它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审美风尚深刻地主导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面貌和走向。

现代意义上的典型的“乌托邦”源于16世纪英国人托马斯·莫尔的创造，其含义具有两重性：一是指它的完美性，一是指其作为“乌有之乡”的非现实性。乌托邦是对应于现实而存在的“异时空”的虚构世界，以其表达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空间性的乌托邦”和“时间性的乌托邦”。前现代的乌托邦是一个非历史的概念，它主要是让人沉思而不是让人行动的。而近代以来的

乌托邦则与历史结缘，在现实的空间展开并预言其随时间推移而能够实现，如此这样，历史就成为一个不断进步、日臻理想化的过程，乌托邦也就具有了推动人们按人类的理想和意愿去创造历史的变革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乌托邦”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具有贬义，是被轻蔑、谴责的对象，但这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和实践检验论的特有语境下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并非整体否定，相反是充分肯定其在思想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的，也就是说马恩否定的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可行性而非这种理想本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这样写道：“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①也就是说科学社会主义并非从天而降，空想社会主义是其产生所依托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

恩格斯接着分析道：“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②也就是说把这种“用头立地”的主观唯心的理想转变为“以脚立地”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理想，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贡献所在。列宁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提纲中充分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乌托邦的区别：“（1）无政府主义在产生以来的三十五至四十年中（从巴枯宁和 1866 年国际代表大会算起是这样。从施蒂纳算起，那还要早很多年）除了讲一些反对剥削的空话以外，再没有提供任何东西。这种空话已经流行两千多年了。”其症结在于：“（ α ）不懂得剥削的根源；（ β ）不懂得社会在向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第 404 页。

② 同上，第 416 页。

会主义发展；(γ)不懂得阶级斗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创造力量。(2)对于剥削的根源的了解。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无政府主义对这些一窍不通。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3)不懂得社会的发展——大生产的作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4)不懂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①所以，马克思主义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要分歧不在于他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在于实现这种目标的途径和方式。而马克思主义将理想植根于客观可能性之上，以时代的上升力量为基础，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的目标，通过改造使世界来实现其理想，所以，它就是一种反映了历史进步要求的理想主义，从而实现了对脱离现实的乌托邦的超越。乌托邦主义理想源于其抽象理性，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从社会结构的运动变化论证其必然，这种理论基础的差异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内在差别所在。乌托邦可以被视为一种不结果的花卉、不成熟的理想，但这并不减损其思想价值和审美意义。因为乌托邦存在的价值主要并不依赖于历史的证明，而主要来自其自身。

由此就需要我们考察人们看待乌托邦的态度和评价标准问题，总的来看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从日常经验、实证主义态度和思维方式出发的，日常经验、意识产生于自在自发的日常生活世界，排斥理性反思、抽象思考，具有反形而上学倾向，将有用、务实视为唯一标准，从来不想在埋头日常事务之外仰望一下星空，考虑一下除被给定的现实外是否还有其他存在的可能。因此在其视野里，“乌托邦”就成为徒劳的空想的代名词，乌托邦主义者就成为无事生非、多愁善感、异想天开的幻想家。而实证主义则推崇“无征不信”，断言只有每个人能感知到的经验事实是“真”，其他都是“幻”，因此对于无法用实证方法与经验手段加以证实和检验的东西，自然持轻蔑、否定态度，这是一种偏狭的实验主义的科学立场，它只关注工具理性的问题，不涉及价值理性的问题。

第二种态度主要是从政治学与社会学的态度和立场来看待乌托邦，其标

^① 《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8～219页。

价标准是一种社会政治功利主义。它一方面看到了乌托邦的真实性、有效性与创造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乌托邦具有虚妄性和无效性;一方面它认为乌托邦表现了人们努力追求“福国乐土”的崇高,另一方面又代表着寻找“乌有之乡”的徒劳;一方面它承认大多数乌托邦表达了各个时代最深切的希望,另一方面又认为乌托邦在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而且,乌托邦理想与它指导的社会实践总是南辕北辙,它在现实中常易“成为一种教条,以其科学主义和理想主义使人类受苦”,所以,“乌托邦一词既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

第三种态度可称为是一种人和文化的价值论的态度。它不再把乌托邦作为蓝图来对照其实际效果,以此评判其预言的真伪好坏,不再关注乌托邦的具体形式结构、历史内涵、细微设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象征、一种文化符号,认为乌托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其意义决不限于那些具体细节与形式设计,真正重要的乃是贯穿其中的“乌托邦精神”,具体的形式设计不过是这种精神的外在载体,而“乌托邦精神”已经远远超出了外在的形式而具有了人学和价值学的意蕴。而这也正是一切乌托邦的真精神、真价值和灵魂所在。^①笔者看待、评价乌托邦的基本态度和立场也是从此出发的。乌托邦代表的是源于人性自身的愿望和理想,所以“现实”对它的态度并不至关重要。

针对乌托邦受到的来自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和市侩主义的嘲笑和轻蔑,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他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②改造现实需要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支撑,否则人就只能处于一种被支配的状态,臣服于一切被给定的、不合理的、僵化的现实。卡尔·曼海姆也这样说过:“如果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将会失去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③我们不能因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受挫,进而怀疑一切试图改变现实的理想,那只能使我们更深地陷入到奴役状态。市侩主义信奉的是一种拜金主义、物质至上的人生观,它抹杀一切精神价值,最终只能使自己成为物欲的奴隶。

① 此段论述部分参见贺来:《乌托邦精神:人与哲学的根本精神》,《学术月刊》1997年第9期。

② Max. Weber, *The Sociology of Religio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3, p. 144.

③ 卡尔·曼海姆著,艾彦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302~303页。

乌托邦对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是不可轻忽的，因为它代表着人的一种超越现实、自主地选择更美好的世界、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的愿望和能力。即使是“空想的乌托邦”也并不是一无可取的，因为它主要代表的是一种人的主观的希望，这种希望源自人性自身的历久弥新的希望，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以一个虚构的完美世界映照出现实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保持一种精神的自由，以超越现实而不是臣服于现实的姿态来宣示人性的高贵和尊严。乌托邦精神世界的塌陷意味着人的物化，所以乌托邦作为一种人之为人的人的自由本性的证明，在任何时代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正如奥斯卡·王尔德所言：“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不包括乌托邦在内的世界地图不值一瞥，因为它忽略了人类不断去造访那个国家。而人类一旦抵达那里，放眼望去，看见一个更为美好的国家，便又扬帆驶去。进步就是乌托邦的不断实现。”^①然而由于 20 世纪的人类乌托邦实践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对于乌托邦的反思和否定成为 20 世纪后半期思想文化的主流。但是，对于乌托邦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既要从那唯意志主义的、完全无视客观现实的乌托邦蛮干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同时，也不能完全地放弃超越现实的理想和希望。美国学者雅各比把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思想大致分成两种类型，即“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蓝图派乌托邦主义”力求精确地规划人类的未来社会，对人们的行动、思想、生活方式都作了严格的规划，这是一种高度监管性的乌托邦，生活于其中的人丧失了对自由的愿望和生活的多样化，所以它应该是一种被摒弃的权力主义的乌托邦。而“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说它是反偶像崇拜的，是因为它竭力避免描绘蓝图，而说它是乌托邦的，是因为它引发了未来‘完全得到满足的至福’”^②。这种反偶像的乌托邦精神在鲁迅身上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方面他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我们怎样做父亲》）。另一方面他又对人们所描绘的种种理想世界心存疑惑，在《野草·影的告别》

① Oscar Wilde,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in *Plays, Prose Writings and Poems*, Anthony Fothergill ed., London: J. M. Dent, 1996, p.28.

② 拉塞尔·雅各比著，姚建彬译：《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新星出版社，2007 年，第 9 页。

中说：“有所不乐意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①“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主义者”则“绝少提供可以把握的具体东西，他们既不讲述关于明天的故事，也不提供有关明天的图画”，他们在洞穿诱惑性形象的危险方面是有先见之明的，这种“反偶像崇拜的乌托邦”是严肃地思考未来的必要条件。

针对时代对于乌托邦的误解，德国哲学家布洛赫用他的“希望哲学”作过这样的回答：他认为人有许多激情，但“希望”激情是最富有人性的，仅是人所特有的，它使人面向未来、面向尚未产生或尚未被意识到的东西、面向自由王国，因此“希望”是人之为人的“人生本质的结构”。他认为：人并非其现有诸属性的总和，而是在走向某种超越他自身的人；人的本质不是既有固定的，而是开放的、尚未完成和规定了的。布洛赫对人的两种希望进行了区分，即“主观的希望”和“客观的希望”。“主观的希望”涉及对不在场的事物的永恒而普遍的表达；“客观的希望”是每个成功的时代产生的具体可能性，它使“主观的希望”得以积极地发展这世界。两者共同组成了“世界的主观和客观的希望内容”。从“主观的希望”产生出“抽象的乌托邦”，从“客观的希望”产生出“具体的乌托邦”。“抽象的乌托邦”带有主观空想的性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乌托邦；相反，“具体的乌托邦”“是现实自身中装载着未来的确定性”，是乌托邦功能中最有结果的形式。笔者尝试将现代中国文学中人们对完美之境、理想世界的向往、期待大致分为“梦”和“理想”。前者主要表现为一种主观单方面的希望，与客观现实没有交接点，缺乏可行性和实践能力。后者则立足于客观现实之上，从社会结构的运动变化来揭示理想实现的必然性，它代表了人的一种按照客观世界的规律来改造世界、自觉地创造历史的能力。

乌托邦的来源在于人的乌托邦心态，对于乌托邦心态，卡尔·曼海姆下过这样一个定义：“当一种心灵状态与它在其中发生的那种实在状态不相称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乌托邦心态。”^②然而并不是所有与直接存在的情境不相称的都是乌托邦心态，所以他进一步强调：“只有那些具有超越现实的取向的心态才是乌托邦心态，而当这些乌托邦心态贯彻到行为举止之中的时候，它们

① 《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9页。

② 卡尔·曼海姆著，艾彦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就会或者部分，或者全部地破坏当时处于主导地位事务的秩序。”^①因此，判断乌托邦的标准主要在于考察其与那个时代占据统治、主导地位的政治权力、社会秩序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费孝通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时曾提出现实中存在着两种权力，一种是“实存权力”，另一种可称为“时势权力”。在变革时代，这种“时势权力”与“实存权力”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有力量，因为它掌握了人心的指向。“实存权力”可以管束人的身体，但管束不了人心。人心所向决定着历史前进的方向。而乌托邦所代表的普世公理正是这种“时势权力”的化身，它与现实的权力秩序构成一种紧张、对立关系，在文学中即表现为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因此必须将乌托邦与其对立面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才能对其超越意向有更准确的把握和理解。此外，该类研究也不限于对乌托邦进行单纯的文学批评，它也是对乌托邦得以产生的特有的社会文化心理的考察和分析。对乌托邦文本的分析也不限于典型的“异时空”的乌托邦，也包括在乌托邦精神指导下产生的“同时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如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异于常人的“狂人”的眼光来揭示人们习焉不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也属于一种现代乌托邦的变体，也就是说它所呈现的现实有赖于“人国”这一理想之光的照亮，没有这种“人国”理想作为光源，现实也就无从显现，因之可以称之为一种“隐性的乌托邦”，而这种“隐性的乌托邦”正是现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再如废名和沈从文的一些偏于“主观性的希望”的田园牧歌类的抒情性文本也属于这类乌托邦的变体，这是一种追求刹那永恒的审美直觉主义的乌托邦，它与“相信未来”的历史进步主义乌托邦相互映衬，成为现代人以精神超越现实的两种主要方式。总之，对于乌托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现代人的信仰或信念体系的考察、对现代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系统的考察，该书也可以说是一种以文学为主体的现代精神现象学的研究。这里的文学也是一种与现代“纯文学”不同的“杂文学”的概念，因为近代乌托邦产生时中国式的西化“纯文学”观念尚未产生，另外西方的“纯文学”概念自身也过于偏狭，将“主情”与“主知”作为划分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过于模糊，因此笔者把康有为的《大同书》等也纳入到文学考察的范围，因为它们既能“启

① 卡尔·曼海姆著，艾彦译：《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8页。

人思”，又能“增人感”，均是情感充沛、个性色彩鲜明的文本。由此，本书研究的乌托邦及包涵若干乌托邦要素的文本大致有如下类型：（1）公理推演式的未来展望，如《大同书》、《新年梦》较为典型；（2）异时空完美世界想象与现实世界的融合，如《痴人说梦记》、《极乐地》等；（3）非现实的现实化，“未来”的当下化体验；即“第三种现实”的文学，典型如《卢梭魂》、《黄绣球》等。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结合”产生的文学形态相似；（4）假托讽喻式的寓言性文本，典型如《鬼土日记》、《猫城记》等，它带有一种反乌托邦的性质，是对已有的乌托邦的观念化规定进行反思、否定的产物，因此也可被称为“恶托邦”。本书并不将这些作品分门别类拣选出来，进行专门研究，而是将这些作品纳入到其所产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来考察乌托邦的精神、心态的变化形态和发展过程。

乌托邦的出现是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现象，它首先与西方中世纪之后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有关，人们开始不再以“上帝之城”作为自己的理想寄托，而是基于人本主义的理想来虚构一个以“人”而不是以“神”为主导的完美国度。所以乌托邦的出现是西方现代理想主义的文化精神的一种重要体现。乌托邦作为人类思想意识中最美好的社会，代表的是人对于社会理性的、应然的诉求，这种诉求与沉默的、实然的现实相遇就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在这种冲突面前，古典的乌托邦主义者大多会退回书斋，以精神上的自由逃避现实中的不自由；而近现代乌托邦主义者则倾向于选择走向街头，呼唤人们起来改造不合理、不自由的现实。于是，近代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理想主义者改造社会的蓝图和规划。所以近代的乌托邦也被研究者称为是一种“拟乌托邦”，即以乌托邦的方式表达立足现实的社会改造的理想。由此近代的乌托邦也就出现了泛化的趋势，并且它也不再只是“空想”的代名词，也可指称一种可以实现但尚未实现的现实。近代乌托邦开始介入到现实中去，成为鼓舞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中国近代的乌托邦大多即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乌托邦，它集中承载的是人们力图超越现实、实现理想的愿望和期待。中国近代乌托邦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近代中国现实问题的严重性已使人们无法回避，即使是远景式的未来展望也与现实密切相关，并多倾向于“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实现终极理想。

乌托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可称为社会乌托邦，一类可称为审美乌托